

# 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动因新探

陈 光

萧公权先生在《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一书中,对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的动机作了剖析,肯定“爱国的情操与个人的野心因而合流,促使翁氏做出如一八九五——九八年间的表现。”<sup>①</sup>进而指出“当他实现雄心的前景看好时,他资助那些有适当条件或者献身于变法工作的人;但当这个好景失去时,他便迅速易帜。”<sup>②</sup> 本文认为将个人野心和爱国思想并列为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的共同动因有失偏颇。诚然,对权力的追逐是一切官僚体制的痼疾,但由此形成的个人野心却又是同具体个人的主客观因素相联系的;当国家民族危机严峻的时候,爱国情操会抑制个人野心,而上升为思想的主旋律。

## 一、从个性看翁同龢的野心

对翁同龢的评价,当时的人们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以忠恳颂之者:“盖立朝数十年,矢诚矢敬,有古大臣风,顾以秉性正直,为小人所忌,遭谗罪废,朝野惜之。”<sup>③</sup> “翁以忠恳结主知,能持大体,亦无丑良相,惜不为众所谅,卒被斥逐。”<sup>④</sup> 也有以奸诈目之者:“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sup>⑤</sup> 翁同龢的个性成为评说其功罪的分歧点。

《清史稿·翁同龢传》说:“同龢久侍讲帷,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sup>⑥</sup> 应该说翁氏执拗的个性是与众臣不协调的一大原因:“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辄拂然,常入报帝必伸己意,众已侧目。”<sup>⑦</sup> 利用与光绪帝的亲密关系先入为主,压制他人言行,自然会使同僚关系僵化。恃才傲物也使他遭人忌恨:“刚相识汉字无多,闻在直时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从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鼎为刘蒲,经公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sup>⑧</sup> 这种性格上的憨直造成了他在同僚中的孤立,再加上帝师身份和毓庆宫独对的特权,强化了他专权的表象,以至恭亲王奕訢临终前,仍“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sup>⑨</sup> 但这一切并不能证明翁同龢的这种个性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戊戌变法后,清廷在列举翁的罪

①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3 年版,第 25 页。

②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第 116 页。

③ 《常昭合志列传·翁同龢》,《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76 页。

④ 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222 页。

⑤ 柴禄致鹿传霖便条,载《中日战争》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576 页。

⑥ 《翁同龢传》,《清史稿》第 41 册第 12371 页。

⑦ 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222 页。

⑧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483 页。

⑨ 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222 页。

责时,提到:“其余重大陈奏事件,朕间有驳诘,翁同龢辄佛然不悦,恫吓要挟,无所不至,词色甚为狂悖。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维,殊堪痛恨。”<sup>①</sup>这份严厉的上谕并未列举翁有野心。翁同龢性格上最大缺点在于固执而无确识,无定见,容易游离,不能处理好人事关系,这自然会被人怀疑有野心。虽说性格与行为思想有相通之处,但毕竟因性格而产生的行为往往不是出于本意,更不同于主观动机。

翁同龢受时人指摘的另一点是“好士名”,说他“雅慕文才,好延揽,凡江浙名流,悉罗致出其门下。”<sup>②</sup>清代科举制度与尊师风俗使士子与业师之间形成非同一般的关系:学术上同气相求,政治上互为援结。翁同龢门第鼎盛,高中状元,又为帝师,自然成为科举场上的楷模,士子争相结识,“翁则一味蔼然,虽门下士无不答拜,且多下与深谈者。”<sup>③</sup>而且凡是在士大夫中深孚众望者,他更是多方提携,主动结交,如张謇、文廷式、康有为等名流,这本是情理中事。但有人指责“翁好延揽,而必求为己用,广结纳而不能容异己。”<sup>④</sup>此说有悖于事实。如以翁康交谊为例,只能说明在维新变革、救亡图存旗帜下的相容性。翁康交往始于1888年康有为上书,“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翁同龢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sup>⑤</sup>于是翁同龢亲自造访康寓,康有为记其事说:“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覆讲求,自未至西,大洽,索吾论治之书。”<sup>⑥</sup>在交谈中,翁同龢坦诚相告:“姑为子言,宜审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sup>⑦</sup>可见两人交往围绕着变法和光绪帝主政两大主题。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上书被阻,遂萌退意,翁同龢听到这个消息,凌晨赶到南海会馆,康有为尚未起床,翁“排闥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sup>⑧</sup>由于翁同龢在光绪帝面前大力推荐,光绪帝对康有为乃“倾心向用”。可见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为国荐才,而不是“必求为己用”的所谓个人野心。

应该说笼统地以个人野心来概括翁同龢的一些思想言行是不恰当的。封建官僚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打算的一面,翁同龢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正直的大臣,忠君爱国是其思想的主导层面,特别是在戊戌变法这一阶段。他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个性弱点,当时就有人说他“性情疏阔而不达情伪,动为人欺。”<sup>⑨</sup>说明了翁同龢在政治上缺乏深邃的眼光和临机应变的能力,以致有人甚至说他不是个政治家。

## 二、时世剧变与为君分忧的情怀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爱国思想是与具体的时代内容相结合的。甲午战争前,翁同龢是清流派首领,其爱国思想基本上未脱离传统忠君的框架,而很少有新思想;甲午战争后面对亡国危险,翁同龢与激进的维新派取得共识,日渐倾向变革。这种思想的急速变化引起了人们

①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264—4265页。

②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74页。

③ 王伯恭:《蛰庐随笔》,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78册,第92页。

④ 金梁:《四朝佚闻》,《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222页。

⑤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50页。

⑥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29页。

⑧ 康有为:《南海先生诗集》小引,《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342页。

⑨ 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第78册,第123—124页。

的瞩目：“惟有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sup>①</sup>“自甲午之后，阅历时艰，恍然于强弱存亡之所在，近日辅翊皇上，筹画新政，仅其一人。”<sup>②</sup>他对西方的进步学说采取积极态度，“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sup>③</sup>以守成著称到赞襄变法的转变，这是时代对他的推动，也是他爱国忠君情思的映射。

甲午战败给翁同龢带来的刺激是强烈的。甲午战争中，翁同龢虽不是战争的指挥者，却是朝廷决策最有力的影响者，他是主战派首领，期望借这次战争建立光绪帝执政的权威。由于“德宗困于孝钦尊严之下，久思出人头地。迨至甲午与日本构怨，竟欲耀武国外，凭陵母后，颇欲灭此而后朝食。时常熟秉政，误入殿撰之言，亦谓日本不足平，迎合上意，极力主战。”<sup>④</sup>战争失败暴露了清王朝的脆弱，也暴露了翁同龢对国际形势和近代战争缺乏必要的知识，不仅无法使光绪帝扬威，亡国危机反而随之而来。因此促使翁同龢的思想在战后向救亡图存方向急速转化。

光绪帝“眷倚尤重”也促使翁同龢力谋肩起扶助皇帝挽救国家的责任。“翁为皇上二十余年之师傅，谊甚亲密，自醇贤亲王逝后，益与之亲切，上之操危虑患，翁亦俱能仰体。”<sup>⑤</sup>《马关条约》签署后，光绪帝即颁谕称：“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sup>⑥</sup>光绪帝寻求自强，身边却缺乏通时达变的人才，“每事必问同龢”，而翁同龢并非精通自强之术的大臣，他承认“每递一折，上必问臣可否，盖眷倚极重，恨臣才太略太短，无以仰赞也。”<sup>⑦</sup>甲午战争前，翁同龢进呈《校分庐抗议》，以义利之辩陈说，试图引导光绪帝做开明君主；甲午战争后，光绪帝发愤图强，而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思路已破产，需要更新的理论指导，因此翁同龢与光绪帝在交互影响中不断前进。

翁同龢和光绪帝有两层关系，君臣和师徒。载湉四岁入宫，从小失去家庭的温暖，而翁同龢中年丧妻又无子女，自然与光绪帝格外亲近，“上幼畏雷声，虽在书房，必投身翁师傅怀中。”<sup>⑧</sup>二十年的帝师生涯形成两人之间极其亲密的关系，翁的门生曾回忆说：“尝有从容讽公退者，公愀然曰：譬诸一家，茕茕孤寡，其两席愁惘然去耶！洎出家门，时语余曰：吾恨不获再拜见皇上，归田后数年，犹时时作此语，盖公惓惓德宗之心与夫殷殷家国之志，固有至死而不渝者。”<sup>⑨</sup>这种关系已超越了君臣界限，而有幼主与老仆间相伴的亲情。这层关系在甲午后更为突出，当时翁同龢再次入值军机，并成为朝廷主要的决策人，从而能够为光绪帝排忧解难。这种关系的重要在于它契合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身家国天下的境界递进，既与个人的努力有关，也受到客观环境影响。从个人的小我到家国的大我再到无我的过程，必然与个人利益发生尖锐冲突，两者的协调既要个人努力，也需合适的环境。客观地说翁同龢虽有恪守儒家信条的意识，却非果敢无私的道德实行家，因此他与光绪帝的个人关系极大缓和了个人与国家的两难选择，使忠君爱国思想建立在现实的利益情感上。康有为曾记载翁与孙毓汶的对话：“孙谓：‘若尔，日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曰：‘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

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0页。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2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51页。

④ 刘声木：《采楚斋随笔》，四笔。

⑤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332页。

⑥ 《清德宗实录》卷369，第838页。

⑦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11页。

⑧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并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474页。

⑨ 唐文治：《茹经堂文集》，《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第251页。

事何?’”<sup>①</sup>对于在等级阶梯上滚爬了大半辈子的当朝大员而言,家国的天平偏向是明显的,而翁同龢迥异的选择体现了他意识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关键媒介正在于他特殊的君臣关系。

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在言行上表现出对变革的主动性。他遍访各方人士,向赫德、欧格纳、李提摩太请教过自强之术,并记录他们的建议;他亲自拜访康有为,请教变法方略,索取改革的书籍;他在行动上追随维新派,“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次第行之。”<sup>②</sup>“时严范孙请开经济特科,常熟主之,此事遂成。”<sup>③</sup>但由于翁同龢缺乏变法的丰富知识,无法辅助光绪帝推行新政,主要依靠康有为维新派的出谋划策。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他急切地“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上举国以听”。<sup>④</sup>由于翁同龢的“力称”、“再持”,终于促成了西花厅问对。事后康有为说:“阅日召见枢臣,翁以吾言入奏,上命召见。”<sup>⑤</sup>又由于他的努力,最后促使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对此他表白心迹说:“康梁有其经世之才,救国之方,此弟之所以冒万死而不辞,必欲其才能得所用而后已也。”<sup>⑥</sup>

这段时期翁同龢支持变法,举荐贤才,其目的正是辅佐光绪帝走变法自强之路,这种为君分忧的心理体现了他忠君爱国的内涵。自然,翁同龢的思想与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尚有距离,他对康有为变法主张并非完全赞成,但亡国危机和光绪帝变法自强的强烈愿望促进了他的变化,从而主动地追综时代潮流,超越了自身思想的局限性。

### 三、变法中出现的矛盾心态

翁同龢支持戊戌变法,但当变法逐渐展开,他与康有为的矛盾却不断加深,以至康有为说:“常熟以吾谤鼎沸,亦欲吾去,乃召还,亦听吾归矣。”<sup>⑦</sup>

甲午后“西法不能不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关于变法的程度和内容却始终是社会争论的热点。康有为在胶州湾事件前的四上书,主要分析局势的危险性,提出不变亡国论。康有为在分析时局时指出:“今当以开创治天下,不当以守成治天下,当以列国并争治天,不当以一统无为治天下。”<sup>⑧</sup>对于当时思想界很有吸引力,而采法日俄的变政思想对“天朝上国”的思维方式是重要突破,康有为的见解对于习惯于传统思维的人无疑是新颖的,也得到世人的赞赏,管学大臣孙家鼐曾说:“若皇上责我变法,我惟举康某人,我则安能?”<sup>⑨</sup>士大夫中也对此抱有期望,有人说:“康水部到京,颇有鼓动。此公摄力胜人,或能有所振发。”<sup>⑩</sup>翁同龢的引荐客观上适应了这种趋势的要求。而胶州湾事件后,维新变法日益进入实行阶段,康有为整体变法框架逐渐超越了当政者的要求,它与翁同龢的变法设想就产生了矛盾,所以西花厅问对后,在翁同龢日记中就有反映:“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务,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条,狂甚。”<sup>⑪</sup>翁任户部尚书时提出:“内库积银千万,京师尽换制钱,天下钱粮征

①②③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6、29、36页。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51页。

⑤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37页。

⑥ 《关于翁同龢与康梁关系的一件史料》,《光明日报》1955年7月21日。

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0页。

⑧ 康有为:《上今上皇帝第四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178页。

⑨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第48页。

⑩ 汪大燮札第87,《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772页。

⑪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0页。

足。”<sup>①</sup>的目标,他曾激烈地反对借洋债,而康有为却把筹款重点放在借款上,与翁的民族情绪发生了冲突。康有为主张尽撤原有法律官制,也有悖经历官场几十年的翁同龢的利益。翁同龢在光绪二十四年4月23日(1898年6月11日)的日记上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sup>②</sup>这天正是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之日,由翁同龢草拟的诏书也提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sup>③</sup>可以说翁同龢的变法思想仍以“中体西用”为主旨,与康有为变政主张有明显区别。

翁同龢的保守意识必然导致反对康有为变法的继续推进。1894年翁同龢读过《新学伪经考》后,并不同意康有为的伪经说,“以为刘歆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sup>④</sup>但康有为这种异端思想毕竟是在学术争论范围之内。甲午战争后,亡国迫在眉睫,翁同龢虽有心协助光绪帝振作自强,无奈缺乏才略,而像康有为这样精通中西变革的人才又凤毛麟角,于是对才的要求超过了对德的限制,翁亲访康有为并把他推荐给光绪帝。随着变法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康有为激进的主张遭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有丰富行政经验的翁同龢预见到这实际上已超越了其变法的初衷,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刊行,更使翁大吃一惊:“上命臣: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变政考》知之。”<sup>⑤</sup>对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的激进言论,连支持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也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而不知圣人之大德配天,圣人之大宝曰位,故曰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sup>⑥</sup>而孙家鼐则更明确地指出:“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sup>⑦</sup>儒家正统伦理道德思想体系正是维系传统社会的基石,康有为欲变更这一基石,难怪翁同龢说他居心叵测。

翁同龢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明显不同是导致他态度变化的根本原因。甲午战争后,国难当头,亟思变革,翁康在爱国思想及主张变革的共同要求下结成了同盟军,胶州湾事件后,康有为逐渐成为变法的指导者,他的思想理论超越了翁同龢的要求。翁同龢在康有为激进主张面前的退缩,反映他毕竟未能走出封建传统的樊篱,对康有为的猜疑从日记的流露到光绪帝面前的陈说,都体现了翁的价值观念和忠君思想的内在要求。翁同龢希望变法在传统范围内进行,而康有为激进的行动使变法成为变革传统的努力,所以翁后来在日记中说:“厥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sup>⑧</sup>翁同龢的这句话说明两人对变法目标的选择有根本的不同。

翁同龢支持变法维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应该说忠君爱国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的个人野心是不可否认的,不过被夸大成无所不在的心理是不对的,至少不能把翁氏的个性弱点、思想局限也归结为个人野心的作怪。其爱国思想也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他的忠君爱国与他个人利益、感情相沟通,加固了其爱国的信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主动地探求救国方案,并与维新派联合,推动戊戌变法的发生。

①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册,第2193页。

②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523页。

③ 《光绪帝东华录》第四册,第4094页。

④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11页。

⑤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2页。

⑥ 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7—358页。

⑦ 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分发并请严禁悖书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1页。

⑧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526页。